

譯著

# 「生活素質」與社會指標研究應用之探討

原著·Mark Schneider

改寫·謝宏昌

社會指標的研究是近年來發展最迅速，並且廣被學術與政府兩方面接受支持的一種研究方法。造成它普受重視的原因是：在理論上，如果我們可以正確地測出現在社會與人民的生活狀況，將可依此制定出相關的政策，來改善人民的福祉。然而，當前的社會指標研究並未達成其預期的效果，主要的理由是與它本身發展初期所具有的雙重特性有關。

## 社會指標的雙重起源

第一個促成社會指標研究運動的因素，是六〇年代的美國政府為測量政策計畫的影響度 (Impact) 與評估政策執行的效力 (Effects) 所創造出來的。六〇年代的美國政府不僅是致力於政策的創新，同時也想發展出一些理性的模型來決定一些資源的分配使用問題；特別是當國防部的 PPBS (Planning, Programming, Budgeting System) 與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廣獲成功以後，使用理性模型來分析政策問題已形成必然的趨勢。然而當這些理性決策在被推廣到社會福利的研究時，可供採用的社會狀況資料却非常缺乏，遠不如預期中的容易套入，社會指標研究於焉誕生。

政府部門對於社會指標的興趣，是想藉以評估

政策計畫的有效度 (Effectiveness) 與效率 (Efficiency)，而非描述社會現況。一如美國國會預算局局長 Alice Rivlin 所稱，社會指標是用來評估計畫執行的 (Performance Measures)；或如一些「新政治經濟體」(New Political Economy) 學者所關心的，政府推行的政策與社會情況互動之後的結果，才是社會指標研究應測量的。易言之，社會指標是行政輔助的工具，倘若能够藉它來蒐集到社會現況資料，社會指標研究將可成為最終極的社會管理工具。

另一個支持社會指標發展的力量來自學術界，學者們想了解社會現況的眞正狀況，想描繪出一些他們感興趣的情形，譬如：嬰兒的死亡率有多少？房屋的分配情形？失業是如何？等等。這類的研究興趣造成學者們廣泛取用普查資料與官方統計來計算與描述社會現況；他們並未企圖去考評政府政策與計畫的執行效果，只想勾勒出一幅人民「生活素質」的景象。

## 「生活素質」測量的

### 理論基礎

以社會指標來測量「生活素質」時，很容易令

研究的使用者存有一種道德性的聯想，那就是：如果我們可以從可測得的眞正社會現況勾勒出「生活素質」的現有程度，那麼我們便可因而決定，假設某些條件不被改變，設法將某一社會指標提昇到某個方向的某一程度，我們便可提高人民在這方面的「生活素質」；也就是增進了人民的幸福。反之，我們也可以看出人民的「生活素質」是否在某一時間後轉劣。於是，拿社會指標在不同社會團體、不同地理單位、時間單位的差異來比較，我們便可測量人民「生活素質」的差異。

誠然，客觀環境的條件變好，人們的心理感覺因而會轉佳。可是，一個客觀測得社會指標的轉變，是否會導致人們在主觀上的看法有同樣的轉變，那就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我們很難說當一些衛生保健、環境、就業問題在指標上都顯示改進了，人民便會在主觀的心理判斷上有相同的反應。除非，在以客觀條件為基礎所建構出來的社會指標與人民主觀感覺的「生活素質」之間存有一種先驗性 (A Priori) 的相關；也就是說，社會指標可被用為「生活素質」的代替說法。就目前的社會指標研究來看，這個目標似乎仍未達到。

本研究想利用兩個以往作過的研究，來探測客

觀的社會指標是否能夠反映出主觀感覺的「生活素質」。根據以上所述的邏輯，客觀的生活條件將與主觀的生活滿意程度朝同一方向變異，那麼客觀的社會指標將與主觀的社會指標存有一次相互間的相關 (Inter-correlation)。

## 主觀的社會指標

儘管一般的社會指標研究多採取客觀的生活條件普查資料與官方統計來計算，如 Sheldon 與 Moore (1968) Grass (1969) Flax (1972) Smith (1973) 等氏所作的研究，Andrews 與 Withey (1973) 兩人却發展出一套主觀的社會指標測量研究。他們兩人認為人們會根據個人生活的經驗，發展出一種情感式的生活素質評估，這種情感式的主觀社會指標於是將一些生活上的特殊事件與情況條件，整合成一套整體性的生活看法 (Global Evaluation of Life-as-a-while)。

這套整體性的生活看法，可由人們對於生活情況的幾個特殊領域 (Domains) 的滿意程度加成後得知。這些特殊領域包括：個人對於住所問題、家庭生活、工作、收入的滿意程度，以及自我効力 (Personal Efficacy) 感覺，對於政府運作的滿意程度，與對於現有的社會服務的滿意程度。

## 客觀的社會指標

相對於 Andrews 與 Withey 所提出的主觀社會指標之幾項特殊領域，Smith 的研究曾指出

幾項客觀社會指標應包含的項目，它們分別是：(一) 收入、財富與就業情況，(二) 環境問題，(三) 健康 (包括生理與心理)，(四) 教育，(五) 社會解組問題 (包括犯罪、酗酒、藥物上癮等)，(六) 疏離感與政治參與。這些重要變數的測量項目詳參表一所列：

表一、客觀的社會指標應測量以下幾項：※

I、收入、財富與就業狀況	VI、社會解組問題
a、一九六八年的勞動力就業百分率	a、一九六八年每十萬人的搶劫率
一九六七—六八年間的變化率	一九六四—六八年的變化率
b、每戶所得低於三〇〇〇元的百分率	b、一九六八年的毒品犯罪率
一九六〇—七〇年間的變化率	一九六四—六八年間的變化率
c、一九六八年每人所得與生活開銷水準的差異	
一九六七—六八年間的變化率	
II、環境	
a、一九七〇年的低標準住宅百分率	
一九六〇—七〇年間的變化率	
b、一九六八年的空氣素質 (三種空氣污染成分的年平均量)	
一九六八—六九年間的變化率	
c、一九六八年的四口人家每戶每年交通開支	
一九六七—六九年變化率	
III、健康	
a、一九六八年一歲以下嬰兒死亡率 (每千人)	
一九六二—六八年間變化率	
b、一九六八年自殺率 (每十萬人)	
一九六二—六七年間變化率	
IV、教育	
	a、一九六七年每一成年人所受教育年數中位平均數
	一九六〇—六七年間變化率
	V、政治參與和疏離感
	a、一九六八年投票人口的投票率
	一九六四—六八年的變化率
	b、一九六八年每人所得投資於聯合基金 (United Fund) 的數量
	一九六五—七〇年間的變化率
	資料來源：Smith, D. The Geography of Social Well Be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3)

※由於研究資料取自普查資料，所以有些年代分別取自不同的時段。

本研究擬採用兩個研究來比較主觀社會指標研究與客觀社會指標研究發現之間的關係。在一九七二年 Campbell 與 Schuman 曾以 Andrews 與 Withey 的架構，作了一個十五個城市的人民主觀社會指標研究，他們的發現如表二所示：由表二我們可以發現：以主觀社會指標來測量生活素質的解

表二：十五個城市居民主觀社會指標的變異解釋量 (OMEGA 平方值)：

測量項目	白人樣本	黑人樣本
對工作滿意程度	不顯著※	不顯著
對家庭滿意程度	1.8%	2.4%
對金錢與收入滿意程度	不顯著	3.4%
對個人效力覺	1.2%	不顯著
對社會服務滿意程度	6.8%	3.9%
對公民守法	2.4%	3.4%
對政府的不信任程度	3.2%	11.5%

※在0.05顯著水準時不顯著

釋力很低，除了黑人對於政府的不信任程度外，我們看不出以主觀社會指標可以有效地解釋出這十五個城市的生活素質之差異。可是，由 Flax 在一九七二年所作的客觀社會指標研究，我們却發現：在這十五個城市中，生活情況的差異情形却是相當大，譬如：在一九七〇年，華盛頓的搶劫率是密瓦基的廿倍，費城的嬰兒死亡率是洛杉磯的一倍。可見在這幾個城市中，客觀的社會指標與主觀的社標所測出的「生活素質」竟然迥異，而且沒什麼相關。

爲了進一步肯定我們的看法，我們可依 Camphau 與 Schuman 的研究，發現人民主觀的社會指標，將各城市的生活素質作一等級的區分，再將 Flax 的發現也依客觀社會指標作各城市的等級區分，然後計算它們的相關值 (Spearman's Rho)；在全部可能的三百六十四個相關中，只有百分之十二在 0.10 的顯著水準下呈顯著，更糟糕的是竟有一半以上是負相關 (請參閱表三)。由此可見，客觀與主觀的社會指標所測得的「生活素質」並不一致，遑論互相相關。

## 結論

儘管客觀的社會指標可以指示我們城市與城市之間有平等與不公平的存在，在政策的制定時有助於我們考慮資源分配的問題；可是，客觀的社會

表三 (A) 白人樣本的主觀與客觀「生活素質」測量之相關 (Spearman's Rho) (顯著水準 0.10)

主觀測量項目	客觀測量項目	相關係數
對工作的滿意程度	沒顯著相關	
對住所的滿意程度	沒顯著相關	
	低收入家庭百分率	• 六一
	低收入家庭改變率	• 五三
	聯合基金投資情況	• 四八
	教育年數中位數	• 五四
	空氣污染改變情況	• 四七
對金錢與收入的滿意程度	沒顯著相關	
	每人所得	• 五八
	搶劫率	• 五四
	聯合基金投資改變率	• 六〇
	教育年數中位數改變率	• 八一
	交通費用	• 七三
	交通費用改變率	• 四九
	空氣污染改變情況	• 四七
對社會服務的滿意程度	低收入家庭改變率	• 五四
	毒品犯罪改變率	• 五五

## 公民能力

失業率	• 五三
失業率改變率	— • 七四
聯合基金投資 改變率	— • 四九
每人所得	— • 四七
毒品犯罪率改變率	• 四八

## 對政府的不信任程度

表三(B) 黑人樣本的主觀與客觀「生活素質」測量之相關 (Spearman's Rho) (顯著水準 0.10)

主觀測量項目	客觀測量項目	相關係數
對工作的滿意程度	沒顯著相關	
對住所的滿意程度	聯合基金投資情況	• 五一
	空氣污染改變率	• 四五
	失業率改變率	— • 五一
	低收入家庭改變率	• 六五
對金錢與收入的滿意程度	沒顯著相關	
自我效力	失業率	— • 四五
	低收入家庭百分率	— • 四六
	低標準房屋百分率	• 四六
	嬰兒死亡率	— • 五三
	自殺率變化情形	• 六四
對社會服務的滿意程度	毒品犯罪率	— • 五〇
	每人所得	• 四七

## 公民能力

低標準房屋 改變率	• 六〇
搶劫犯罪率	— • 七四
搶劫犯罪率 改變率	— • 五九
低收入家庭 百分率	— • 七七
低標準房屋率	• 五七
低標準房屋 改變率	• 六五
嬰兒死亡率 改變情形	• 四九
搶劫犯罪率	— • 七〇
搶劫犯罪率的 改變情形	— • 五四
毒品犯罪率 改變情形	— • 四九
低收入家庭百 分率改變情形	— • 四六
低標準房屋率 改變情形	• 四八
嬰兒死亡率 改變情形	• 五五

## 對政府的不信任程度

指標並不代表人民主觀的對生活條件滿意程度。人民的主觀看法似乎是與物理環境與條件沒直接的關聯。因此，我們必須澄清客觀的社會指標所測量的並非真正人民態度的反映。

此外，這個發現也指示了我們在社會指標研究時應再注意幾點：一、在作此類研究時，研究單位的

的選擇與統計資料的蒐集仍有許多困難；因為要找出客觀與主觀的社會指標都一致的地理單位並不容易，也許只有特殊定義的社區才可作為研究單位。二、以一個城市作為研究單位的辦法顯然行不通；也許我們必須要找出一些城市內較同質的小單位來作為研究單位，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設計出一些適合研究較小區域的社會指標，並且有可操作性的社區定義。三、以此類推，也許作一些同宗性團體、同種族團體、同階級、同宗教的團體之社會指標研究，較可在客觀與主觀的社會指標上得到一致的發現。

由以上發現，我們可說以客觀的普查資料所作的社會指標，並不見得是在測量人民的「生活素質」。以行政區域所劃分出來的社區單位來統計資料，雖然有利於行政規劃，但不能代表人民的生活經驗之總和。也許，將較小、較同質性的社區定義出來，再來蒐集它們的客觀條件，然後計算出來的社會指標會較能與人民的生活經驗接近。我們應該放棄探索「生活素質」這種抽象概念的存在，轉而測量政府政策對於各種不同社會團體或社區所產生的影響，來修訂我們的政策方向。（本文作者現任行政院研考會專員）

## 參考資料

1. Andrews, F., and S. Withey, "Developing Measures of Perceived Life Quality: Results from Several National Surveys" (Ann Arbor, Mich.: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1973).

2. Bauer, R., and K. Gergen (eds.), *The Study of Policy Formation* (New York : Free Press, 1968).
3. Bish, 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tropolitan Areas* (Chicago ; Rand McNally, 1971).
4. Campbell, A., "Aspiration, Satisfaction and Fulfillment," in A. Campbell and P. Converse (eds.), *The Human Meaning of Social Change* (New York : Russell Sage, 1972), pp. 441-466.
5. Campbell, A., P. Converse, and L. Rodge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Subjective Measures of the Quality of Life, Ann Arbor Michigan, November pp. 14-15, 1972.
6. Campbell, A., and P. Converse(eds.), *The Human Meaning of Social Change* (New York : Russell Sage, 1972).
7. Cazes, B.,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Indicators : A Survey," in A. Shonfield and S. Shaw (eds.), *Social Indicators and Social Policy*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pp. 9-22.
8. Flax, M., *A Study in Comparative Urban Indicators : Conditions in 18 Large Metropolitan Areas* (Washington, D. C. : The Urban Institute, 1972.)
9. Gastil, R., "Social Indicators and Quality of Lif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30, No. 6 (November/December 1970), pp. 596-601.
10. Gross, B. (ed.) *Social Intelligence for America's Future* (Boston : Allyn and Bacon, 1969).
11. Henriot, P., *Political Aspects of Social Indicators :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New York : Russell Sage, 1972).
12. Mitchell, W.,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Social Research*, Vol. 35, pp. 76-110.
13. Rivlin, A., *Systematic Thinking for Social Action* (Washington, D. C. :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1).
14. Rossi, P., "Community Social Indicators," In A. Campbell and P. Converse, *op. cit.*, pp. 87-126.
15. Sheldon, E., and W. Moore (eds.), *Indicators of Social Change* (New York : Russell Sage, 1968).
16. Smith, D., *The Geography of Social Well Be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 McGraw-Hill, 1973).
17.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Center for Coordination of Research on Social Indicators, *Social Indicators Newsletter*, No. 3 (Washington, D. C. : SSRC, 1973), pp. 2-6.
18. Springer, M., "Social Indicators, Reports and Accounts," *The Annals*, Vol. 388, pp. 1-13.
19. Stagner, R., "Perceptions, Aspirations, Frustrations and Satisfaction: An Approach to Urban Indicators," *The Annals*, Vol. 388, pp. 59-68.
20. 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Toward a Social Report*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9).
21. Wade, L., and R. Curry, *A Logic of Public Policy* (Belmont, Calif. : Wadsworth, 1970).